

contents

6

孔憲娟
我們什麼時候改善拉拔自己長大的社區呢

10

王繼維
從不會到會
只需要投入與決心

13

何榮幸
當記者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報導有改變社會的機會

17

周聖心
找到相通語言
共創更好的環境想像

20

林宗憲
體制外的高齡教育
故事裡看見可能性

23

林峻丞
了解真實議題
小草書屋伴孩童成長

26

紀惠容
社會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翻轉」

30

張婧姿
翻轉刻板印象
參與在地生活

33

楊志彬
讓學生能發自內心
感受到自身和社會的關聯

36

楊喬安
創造的社群正是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40

鄭惠如
提供弱勢就業機會
食藝的社企之路

43

羅欣怡
走過博物館逾十年
推廣文化平權

48

陳亮君
大學生就是很迷惘呀
這是很正常的

51

陳秋欣
社會教育就是透過不同的管道去傳遞知識和想法

54

楊旻恩
社教所是讓你慢慢摸索自己與慢慢理解別人的地方重點是「慢慢」

57

楊婕
透過社教前進
跨足科技新領域

2

社氏100度·教室外的光與熱——社教達人專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簡介

本系重視透過社會創新與教育傳播的多元策略，在各級學校之正規教育場域以外的社區、非營利組織、文教機構及網路媒體平台，推動有利於社會大眾面對不同生涯階段重要挑戰、解決公共問題、營造社會共善的終身學習社會。目前，本系課程大致分為「社會創新與社區事業」、「終身學習與高齡教育事業」及「社會行銷與文化傳播事業」三大學群。

（一）社會創新與社區事業

以社會投資、社會企業、社區營造等社會創新方案，開拓並整合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各類資源，藉以回應國內外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培養民眾具備參與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的公民素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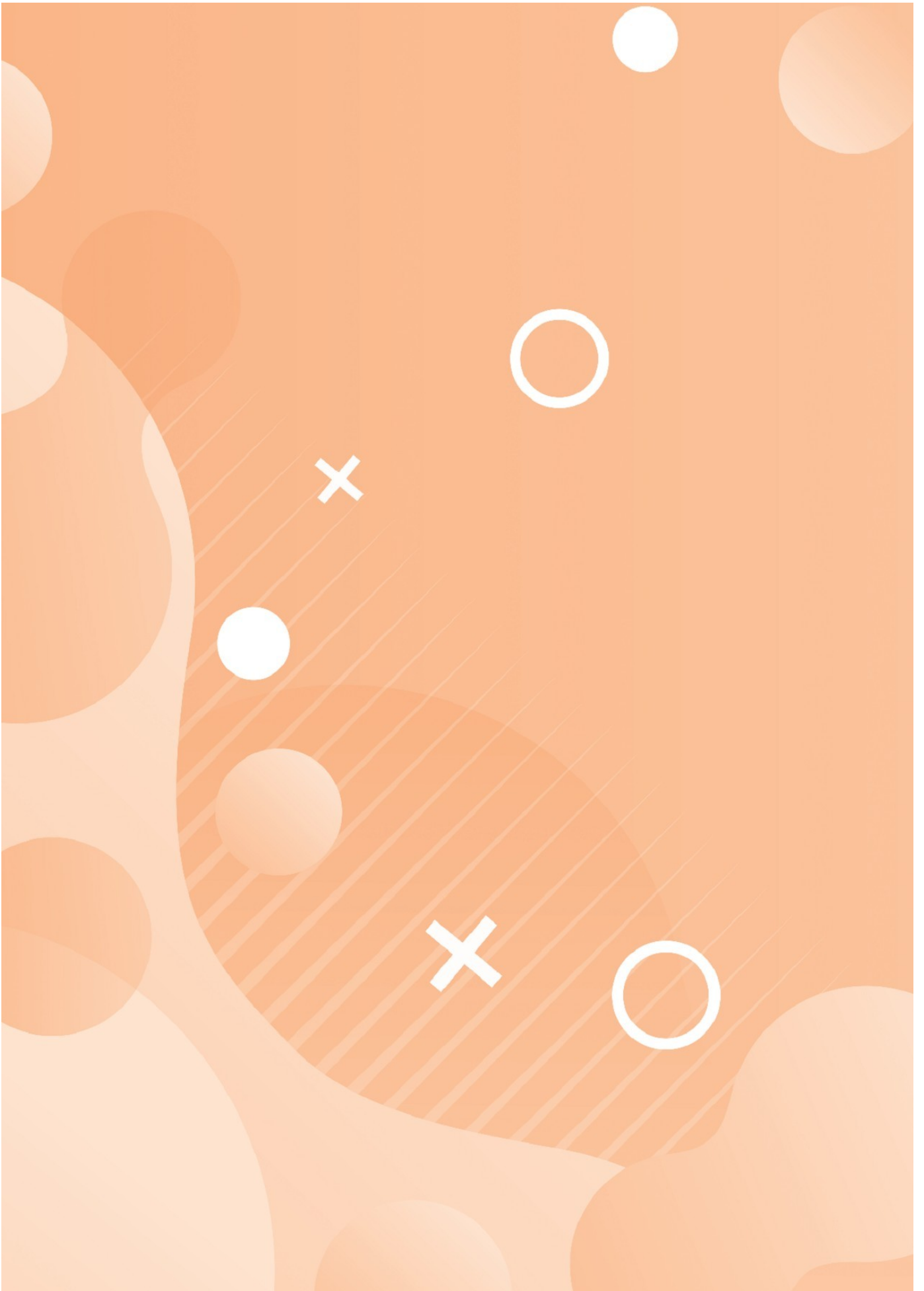
（二）終身學習與高齡教育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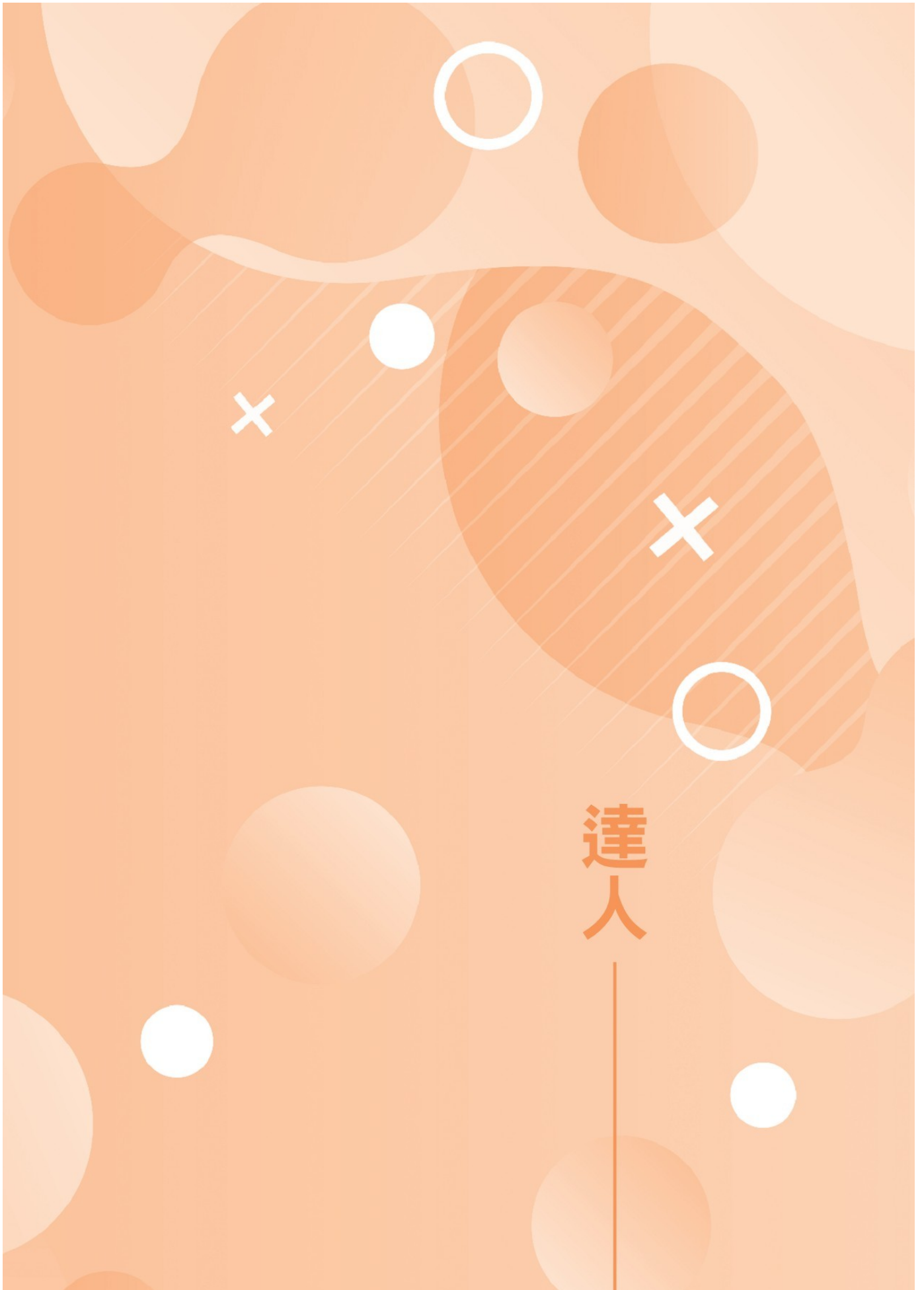
培養學生運用創新的學習方式及規劃終身學習及高齡者學習方案，促使成人與高齡學習者在面社會變遷的衝擊與壓力時，能透過自我及群體的轉化力、創新力、組織力與整合力，解決不同人生階段的重要發展任務，營造終身學習社會。

（三）社會行銷與文化傳播事業

運用多元創新的平面及影像媒材、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行銷及社會行銷方案，在包含公私立博物館、科學館、文化中心、圖書館、美術館等文教機構內外及網路媒體平台，推動引發民眾反思學習的終身學習方案，藉以提升民眾的多元文化素養。







我們什麼時候改善拉拔自己長大的社區呢

孔憲娟：「這些好的結果，都是一直去試，然後試出來的。」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孔憲娟，古風里里長。早年致力於處理師大夜市居民與賣家的紛爭；推動小白屋、芒果香草園，為古風里注入人文藝術氣息，共創社區榮景。

選上里長，全是無心插柳

來到古風里辦公室，只見孔憲娟一刻不得閒地忙進忙出，本次採訪與里長日常一同展開。「當里長，完全是無心插柳。」孔憲娟說，當年，父親因急性心肌梗塞，走得很臨時；半年後，媽媽也因病過世。她覺得自己沒把父母照顧好，陷入人生低潮。

至親離開，讓孔憲娟改變人生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孔憲娟引用這句名言，她認為，是時候應該開始為里上有所付出了。因緣際會下，她決定轉移生活重心，毅然決然投入里長選舉。

因為從沒選過里長，孔憲娟踏實地刻苦努力。她把選舉相關法律全部讀熟，研究哪裡可以合法插上候選人宣傳旗，其他候選人不懂這些，便檢舉她，殊不知孔憲娟的作為完全合乎規範，她笑著說：「當競爭對手發現檢舉無效時，就開始質疑、甚至造謠我有黑道背景。」

「很單純，就是把選里長當成『一件事』來做，會選上真的是僥倖。」孔憲娟笑著說，一個認真做事的里長，要被別人取代是相當困難的：「既然選上了，那就要努力做、認真做。」孔憲娟出身於復興商工，學美工的她，沒有任何政治經驗；身為一個意外當選的「空降里長」，手上也沒有充足資源。「一開始，真的像瞎子摸象一樣。我在過程中碰了很多壁，這些好的結果，都是一直去試，然後試出來的。」



困難重重的夜市問題

回憶起剛當上里長時的情境，孔憲娟還歷歷在目。「剛起步時，非常困難。」就職第一天，半夜十二點多，她就接到里民氣急敗壞打來的電話：「孔里長，妳還在睡覺嗎？妳怎麼好意思睡得著？」讓孔憲娟頓時驚覺：原來這就是里長的生活！

那時候，主要由古風里管轄範圍的師大夜市，正值居民和商家爭執最嚴重的時候。「幾乎天天都被打電話投訴，我就是這樣被罵出來的。」回憶起當初，孔憲娟忍俊不禁。剛接下里長職位的前幾年，龍泉街上到處都是垃圾。當時，每天下午三、四點，開始有賣衣服或食物的攤販蜂擁而至，大約七、八十攤，此起彼落的推車噪音，道路擠得水洩不通，讓居民受不了；到了半夜，各個商家打烊時間不一，拉下鐵門、摩托車啟動，又是一陣嘈雜。「如果有住戶受傷、出事，要叫救護車，就得經過重重人潮。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如果在商業區當然無話可說，但其實師大夜市是住宅區。」孔憲娟實地勘查後，才發現里民們真的日日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有次，孔憲娟在半夜12點多去夜市勘查，看到了讓她難以置信的景象。攤販收拾完東西後，竟然直接將所有垃圾置之於地，認為全部交給清潔隊清潔即可。孔憲娟眼

睜睜看著一個賣耳環的攤販，將一整排塑膠片直接往地上倒，甚至連裝袋都沒有。她義憤填膺地走向前和攤販溝通，賣家卻理直氣壯地認為「大家都如此，這沒什麼。」對這副理所當然的態度，孔憲娟感到相當錯愕與震驚，也讓她下定決心要整頓和處理這件事。

孔憲娟請來清潔隊，除了要他們將攤販留下的垃圾山清除外，也請他們貼公告：「亂丟垃圾，罰六千元。」原先清潔隊員嗤之以鼻，認為孔憲娟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隨口說說罷了。即使如此，孔憲娟仍然要求清潔隊徹底執行：如果亂丟垃圾，前兩次給勸導單，第三次就開罰，且保證不銷單。這麼進行了幾個月，店家和攤販才終於相信，在師大夜市隨意棄置垃圾，會被罰款。

孔憲娟說：「其實，不隨便丟垃圾，明明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啊！」然而，在她上任前，制度還沒有建立完全，因此仍需時間去慢慢改變。「先把環境衛生弄好，再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一步一步來。」一路走來，她是這樣腳踏實地在為古風里鋪路。

社區價值為圓心，畫出真情的圓

除了處理師大夜市問題外，孔憲娟也花許多心思在其他社區事務上。「坦白說，我自己對政治比較沒興趣。」美工出身的她，尤其著重於人文藝術和環保類型的社區活動，因此「小白屋」和「芒果香草園」就這麼誕生了。

小白屋是什麼呢？它主打「把家裡壞掉電器拿過來，都有人教你怎麼修理」！除了修理物品外，也能用堆肥做手工皂、將廢棄玻璃做成裝置藝術，例如：花瓶、燭台等等。此外，孔憲娟認為，身為里長，就是要替里民把關，並善用手中資源，所以她也積極整理和認養閒置空間。「台北有太多閒置空間了，應該好好善用。」她以中央通訊社舊址為例，該處房舍良好，磚牆兼顧，如未好好發展實屬可惜。她和其他文史工作者，一同把這塊歷史挖出來，不僅對建築有所瞭解，也產生了溫厚感情。「如果今天只是把它交給建設公司，他們可能只在意獲利。」若由里長和居民共同打造，則更可能讓大眾與建築古物共存共榮。



「我們的驕傲就是創意，創意來自一代一代。臺灣是一個小島，但因為它擁有許多文化，所以孕育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在我們這一代，父母沒辦法給什麼，只能讓我

們努力受教育。但透過一代接一代累積下來，我們慢慢擁有無限的創意。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只要有你的想法，都可以好好發揮。」言談之間，孔憲娟流露出對社區和文化的熱忱情懷。

被詢問這麼多年來都做了些什麼時，孔憲娟笑著說：「妳們也看到了，我每天這樣忙進忙出。要我從何講起？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了；早上的事情，下午就忘了。」於是，每過半年，孔憲娟就會從好幾千張照片挑選值得留念的活動痕跡，記錄自己做過的所有事情。只見辦公室內一整面牆，密密麻麻貼滿了孔憲娟過去行走過的軌跡，時至今日此刻，她的電話仍舊響個不停，也一直有訪客前來拜訪。

當了這麼多年的里長，即使過程中挫折和困境不斷，孔憲娟仍甘之如飴。「我們從小受之於社會，太幸福了。」她不在乎自己是否大富大貴，而是時時刻刻惦記如何回饋社會和社區。「年輕時，為了養家，都在外地工作，那我們什麼時候改善拉拔自己長大的社區呢？現在既然有機緣，讓我成為里長，我日日都在想，怎麼在自己的人生後半段，讓社區更美好，也讓居民更幸福。」

從不會到會 只需要投入與決心

王繼維：「我學習的那些理論，能幫助我分析、了解自己。」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王繼維，綽號老王，台青蕉樂團團長、台青蕉香蕉創意工坊創辦人，同時也是香蕉自耕農。自小參與社區營造，長大成人後，他以自己熱愛的音樂結合香蕉產業和社會議題，透過文創和大眾對話，成功帶起旗山老街的繁榮，為社區注入活水，也盼望將旗山香蕉推廣至全世界。

創業：社區是世界的縮影

王繼維在15歲開始跟著父親，參與社區營造；18歲，他守護旗山車站，並嘗試活化旗山老街；23歲，他成立青年志工團隊；到了34歲，他決定在家鄉深耕。「回到家鄉，才覺得自己對這裡既熟悉又陌生。」王繼維說，其實家長和體制都在無意間阻止我們進入社區，例如：他可能會被要求回家吃飯，所以不知道哪裡有社區美食；又或是學生大部分的日子都被綁在學校，體制要求每個人的一致性，導致許多人長大成人後，反而不知如何求新求變。「別輕易離開家鄉。」王繼維將父親說的這句話銘記於心：「我爸一直覺得小孩會改變學校，而不是學校來改變小孩。」

「問了旗山，你發現你不了解旗山；做了旗山，你覺得不住在旗山；發展旗山，你知道不是只有旗山。」從在地社區出發，憑著一股熱血和底氣，王繼維決定創業——不是開一間公司，而是從擺攤開始。他在街上奮力叫賣，但總是門可羅雀：「常常讓客人試吃三盒，結果只賣出一盒。」王繼維笑著說，「而且賣出去的那盒，還是一個阿伯看我認真才跟買的，他其實沒有想吃。」

「從不會到會，只需要投入與決心。」一路走來，王繼維從完全不會做蛋糕開始摸索，逐漸產生興趣，也意識到家鄉旗山需要新的產物，才有機會將香蕉發揚光大。「台青蕉」香蕉蛋糕打開知名度後，老街上，許多店家也跟著開始做，彷彿香蕉產業重新活過來：「整條老街都『香蕉化』了！」



一開始，光是為了做出兼顧美感和實用性的攤車，王繼維和師傅就討論許久。好不容易，終於開始以攤車形式販賣，卻屢屢遭逢挫折：「我在旗山老街常被其他商家檢舉。」王繼維苦笑著說，因為生意太好，竟導致他人眼紅。所幸，他最終找到一個實體店面，「旗山台青蕉香蕉創意工坊」正式開張。之後，因為接受媒體採訪的緣故，生意更佳興榮，每天需花費十一至十二小時，來製作香蕉蛋糕。「很多事，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做了，每天都走得很踏實。」

以音樂為媒介，結合香蕉產業

隨著台青蕉愈來愈廣為人知，王繼維需要處理的事務也愈來愈繁重。他說自己的生活，就像電風扇開關一般，須不斷轉換身分：他除了親自照顧香蕉園，還得會做蛋糕；同時，也要處理店內行政事務。名氣大開後，導覽和演講邀約不斷。為了獲得更多資源，他也必須寫企劃向公部門提案。最重要的是，他還擁有一個「台青蕉」樂團：「不能說『我不會』，而是要說『我試試看』。在做事的時候，能快速養成很多能力。」

「藝術工作，是由社會來定義你是誰。」王繼維說，文化產業的存在意義，就是和大眾產生互動。他以音樂為媒介，包裝議題，也訪談了60幾位的農民，讓他們說出自身經驗與感受，例如：香蕉售價暴起暴跌、外銷困難等等。另外，王繼維也帶媒體、記者到香蕉園參觀，給農民直接發聲的機會。

起初，王繼維在創立台青蕉樂團時，議題導向相當明顯，音樂元素也很具體；後來，他希望留更多想像空間給觀眾，改成適度加入理念，漸漸弱化目的性，讓聆聽者或消費者自己去感受。如果受眾對這件事有所啟發，會自主性地嘗試了解：「引發動機，才是我做音樂的意義。」

一切由零開始，難道不會焦慮失敗或失業？王繼維說：「最初就是一股衝動！反正年輕有的是時間。」但他也坦承，時間與收穫不一定成正比，但至少自己嘗試過，就不怕留下遺憾。

農村成教室，香蕉即書本

十多年來，王繼維在做的全是社會教育。他賣香蕉蛋糕，透過社會行銷推廣自己理念；他玩樂團，在舞台上展演旗山人的文化；他當起農夫，邊做邊學。一切從零開始，逐漸走到一；現在，仍持續蓬勃。香蕉原先沒有文化，只是經濟產物。農村即教室，老師即蕉農。書本都在這裡。教育不一定在教室。

儘管王繼維從小即身體力行「社會教育」——參與社區營造、以文創結合產業——但他仍然認為體制內的學習是必要的。「我學習的那些理論，能幫助我分析、了解自己。」王繼維舉例，他在課本或課堂上，了解產業和公共性的關聯，進而認為產業是形成公共性的重要元素，因此不排斥經濟和營利。



他建議，大學時期，要盡量讓自己接觸多元事務，甚至直接去感受不同的異文化。「我大學的時候，為了某個和弱勢族群相關的報告，跑去和真正的漁民相處三個月。」他笑著說，很多大學生做報告時，都直接切割分工，自然無法全面地進行學習：「常常是我上台、你做PPT。這種分工模式，只能讓你獲得分數，但實際上，你可能根本沒學到什麼。」



最後，王繼維說：「香蕉是一個符號，它有千萬種詮釋方式。」愈在地，愈國際。對他而言，旗山就是全世界的一部分，王繼維要一步步增加影響力，持續推廣屬於臺灣的台青蕉。

當記者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報導有改變社會的機會



何榮幸：「過程很痛苦，但熬過痛苦後，共識就逐漸出現」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何榮幸，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創辦人、執行長；以及《報導者》總編輯、創辦人兼總編輯。他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成立《報導者》前，曾在《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擔任記者；他也曾擔任《天下雜誌》總主筆、「獨立評論@天下」網站主編。對新聞工作深具熱忱，將其視為一生志業。

記者，作為一生的志業

「我從事新聞工作，是為了改變社會。」抱持初生之犢的熱血，何榮幸一頭栽進了新聞界。實際進入新聞工作後，何榮幸才發覺自己當初想得太天真，他無法馬上做自己有興趣的議題。首先，他必須花很多時間累積新聞經驗，並獲得主流機制對他的認同，才能一步步爭取他想做的題目，再進一步改變社會。「在任何領域，新鮮人都無法在一開始就落實理想，必須先埋鍋造飯，累積實力和籌碼，獲得組織認同，才可能爭取實現理想的空間。」

儘管需要投入的時間比想像中更長，何榮幸當時仍按部就班，竭盡心力，磨練自己身為記者的專業能力。他一開始進入《自由時報》市政組，短短三個月後，因為獲得主管認同，調職至全國性的政治新聞組。這件事帶給何榮幸更多信心，他又花了幾年時間的累積專業能力，漸漸地，他終於能嘗試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報導。

「當記者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報導有改變社會的機會。可是，能不能真正改變社會，是另外一回事。」其實，何榮幸在漫長的記者生涯中，常常有數不清的倦怠。



尤其，當他抱持改變社會的想望，卻在當了好幾年記者後，發現世界還是沒什麼改變時，不禁讓人心灰意冷，開始思考從事新聞工作的意義究竟為何。初期，他不太適應這件事，但隨著時間愈來愈久，他知道，這就是新聞迷人之處——挑戰性。「想要實際促成改變，必須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例如：現在熱門時事和報導是否相關、現任政府首長本身是否重視該問題。」秉持這個想法，何榮幸便減少過高或不切實際的期待。「當十則報導中，有一則報導改變了什麼，這樣就已經足夠了。」他說，一件事有意義，就值得被報導，增加它被眾人看見的可能性。

何榮幸再舉例，《報導者》一年大約累積四、五十篇報導，但真正具體改變社會的，可能僅有一、兩件，例如：之後出版成書的《血淚漁場》和《廢墟少年》，前者更引起行政院和立法院高度關注。

創辦《報導者》：堅持真實與深度

《報導者》強調深度報導，最重要的即是完整性和脈絡化。何榮幸說，《報導者》的內容盡可能接近事情真相，但不代表沒有立場——事實上，他們大多數的報導，都站在社會弱勢和被剝削者這邊。「對我們來講，新聞沒有客觀，但你要讓你的

主觀價值涉入能夠接受檢驗，亦即你的新聞是否真實，並做到脈絡化。」何榮幸說，「如果能被檢驗，即使你的新聞有立場，一點問題也沒有。」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所以報導者上的東西都是公共財。」何榮幸表示，只要沒有營利行為，僅需註明來自報導者，即可自由使用他們的內容。

打開《報導者》網站，你看不見點閱數字。何榮幸打破多數網站必須衝流量的制度，堅持不放上點閱率，因為那樣容易淪為「內容農場」。沒有點閱數字，怎麼評估一篇報導的影響力呢？「網路媒體，有轉寄分享，你才存在。」何榮幸說，讀者「願意點擊的新聞」和「願意分享的新聞」並不相同，《報導者》的優勢即在於許多人願意分享和轉載他們的文章。另外，如果從捐款金流介面發現捐款明顯增加，也可以知道專題確實受到關注和迴響。

不同世代想法很不一樣，磨合沒有捷徑，需要時間去溝通。團隊有許多年輕夥伴，何榮幸身為資深前輩，也常常謙虛地和他們相互學習。他希望，既能產出優質的文字內容，也可以發掘一些多媒體呈現方式。「數位部門年輕記者常常固定開讀書會，參考其他國外媒體的做法。也有個人進修，例如：我們同事去參加台大資工所課程，學習寫R語言。」《報導者》一路走來，致力於達到「內容完善」和「創新思考」。

《報導者》的一切都是從無到有，不像其他媒體可能已有一套做事的SOP。「過程很痛苦，但熬過痛苦後，共識就逐漸出現。」何榮幸認為，像這樣非營利媒體的創舉，可以為新聞界帶來更多想象和可能性。

從社會學出發，做新聞記者

《報導者》成立初期，成員僅有23人。其中13位是何榮幸特地找來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例如：房慧真；另外10位，則是透過海選的方式徵求記者，共有四百多人前來徵選。「海選不設任何條件。」何榮幸說，新聞技術和能力都可以再學習，最重要的是對於新聞是否有熱忱，以及認同《報導者》媒體模式——全心全意只做深度報導；只接受捐款不買廣告——這份熱忱，遠比你是否在新聞界有實務經驗來得重要。於是，當初除了錄取一些具備記者資歷的人，也錄取好幾位沒相關經驗的年輕人。

「資深記者，最珍貴的就是人脈。」何榮幸表示，自己過去在傳統媒體耕耘二十幾年，擁有許多資源，能以此協助新記者。



此外，他也說，若一個記者經驗足夠豐富，也可以快速判斷新聞議題的好壞或新舊，例如：若先前某個議題曾被報導，就能進一步思考該如何做出區隔。

何榮幸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讓他在新聞工作上，能以社會學的觀點出發。創立《報導者》後，他協助其他同事寫報導，探討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社會學的訓練，就是要求任何公共性的問題都不要只看表面，或是把它孤立起來、個別探討。例如：遊民的存在，可能不是個人努力與否的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貧窮。」他說，社會科學背景的記者，擅長以脈絡化的方式呈現一個新聞事件，對深度報導很有幫助。「社科背景出身的人，當上記者後，慢慢學習採訪技巧與新聞倫理；傳播背景出身的人，當上記者後，漸漸學習用社會科學角度來看結構性的問題。」他認為，無論大學所學為何，只要願意持續進修，都能讓自己更出類拔萃。

找到相通語言 共創更好的環境想像

周聖心：「柔軟是與對立者對話的方式。」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周聖心，畢業於「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從事教育工作多年，曾任擔任小學老師、人本基金會編輯等，現任職於永和社大，同時為「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

走出體制內教育

回顧周聖心的職涯歷程，小學老師、兒童日報編輯、人本教育基金會編輯、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內容皆與教育相關。1985年，正式畢業並回到花蓮從事教職之前，周聖心短暫在林口農村的小學代課，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與自己生命經驗落差極大的家庭。到學生家訪問是周聖心的職務內容之一，當她看見一個學生，全家住在大通鋪上，整個空間只有一個燈泡擺在角落，供小雞取暖，家裡沒有書桌，學生回家無法寫功課。周聖心說：「我認識到，每個小孩都有學習過程中特別的需求。」

畢業後，周聖心返鄉，回到花蓮的私立小學任教，但她不太適應填鴨式的教育方式，尤其當時的學校教育常有體罰，考得不好、不守規矩等等，不只在學校被老師處罰，回家如果家長知道小孩被體罰，很可能再打孩子一次。「我覺得教書應該是給小孩未來美妙的憧憬，或是讓他們成為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周聖心決定辭職，在花蓮擔任作文家教，隨後來到台北的「兒童日報」和「人本教育基金會」。她一直不安於體制內的想像，嚮往教育更多的可能性。

現在周聖心是千里步道協會的執行長，同時任職於永和社大。過去長期從事兒童教育工作，當周聖心初次接觸成人教育，她對於社區大學的功能抱持懷疑態度，不太確定成人教育的影響力。但她漸漸看到在社大發展自我的成功案例，像是一位家庭主婦，在小孩長大並卸下部分家庭責任之後，在社大發展出新的興趣，她的丈夫後來也成為社大的學員。周聖心認為，「社大創造一個空間，讓人重新發現自己。」



從「千里步道協會」 走進各地文化

1990年，周聖心在「人本教育基金會」擔任雜誌編輯，當時黃武雄在雜誌書寫「人與世界」專欄，因此與周聖心相識，接著周聖心離開「人本」，在黃武雄發起的新社大籌備中，成為社大助理。黃武雄及小野等人在2006年發起千里步道運動，周聖心因為助理身份而持續協助運動籌劃，但是一直沒有出現適合的執行長人選，周聖心坦言，「我最初抗拒了一個月」，但後來她告訴自己，「路在眼前，如果不轉身，就向前走」，而且過去沒有人做過這件事，代表周聖心有很大的自由和發揮的空間，她便接下協會的執行長工作。

推動千里步道的核心，是希望透過步道，不只關注環境議題，更期望經由步道的串連，一併帶動地方特色與在地議題。周聖心娓娓道來，千里步道協會曾經帶著參與者騎單車，追著「虎尾」裝載甘蔗的五分車，一路騎進糖廠聆聽虎尾的製糖歷程。一百多年來，煙囪持續冒著白煙與香甜氣味，十一月到隔年三、四月都會採收甘蔗，工廠裡的機器同樣轉過一個世紀，千里步道協會想帶民眾感受台灣的百年文化。「虎尾還有黃俊雄布袋戲，還有很多特別的東西。但是當你沒辦法深入認識它的時候，它就只是一個地名。」周聖心表示。

尋找共通語言 串連「阿朗壹」在地特色

推動各地區步道運動，因為每個團體都有各自關注的議題和立場，千里步道協會必須協調不同群體的觀點。周聖心初到屏東旭海地區時，台灣唯一一條未開發的海岸線「阿朗壹古道」存廢的議題已經被熱烈討論，環保團體希望可以保留古道原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但是每條街道都有居民舉著白布條：「只管綠蠟龜，不管活人的生路。」有些居民在意經濟發展，而環保團體希望能保留自然景觀，相對的立場不易進行溝通，加上千里步道協會是台北來的「外人」。為此，千里步道協會透過兩、三個管道，四處邀請關心步道議題的團體，告訴他們協會想串連環島路線，並且很願意「阿朗壹」成為南部的第一條路線；而想要達成這個目標，不同領域需要共通語言。

周聖心透露：「柔軟是與對立者對話的方式。」協會透過屏東的在地人脈，邀請當地關注阿朗壹古道議題的群體對話，嘗試尋找雙方關注的交集。由於居民希望當地有好的發展，以保障他們的收入，所以千里步道協會派工作人員駐村一個月，理解「旭海地區」的真實需求。當時的工作不只有規劃文化觀光、保存古道，更協助社區發展在地特色。協會推出的旅遊路線，包含規定遊客聘請當地導覽員帶隊走訪阿朗壹古道，加上周邊的「東源」、「港仔」聚落共同規劃，推出三天兩夜的行程。

發展的過程中，周聖心協助部落之間建立合作關係與良性競爭。例如，旭海、東源和港仔部落都有販售「風味餐」，起先三個地方的定價不同，協會就帶著部落的人到定價高的部落觀摩，了解如何藉由設計，讓商品的價值與價格一併提升，這樣的舉動既能增加在地收入，也帶給外地人更精緻的文化體驗。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居民逐漸信任千里步道協會，理解他們想要創造共好的關係，也認同協會所說，「不管開不開路，社區都要有特色。」

整體而言，步道運動捲動得很快，其中仍有讓人氣餒的時刻。像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資源支持，需要耗費許多時間溝通，而且想要合作的首長層級愈高，需要的時間就愈多，過程中很花力氣。此外，即便感覺環境保護的觀念受到很多人認同，「但真正走到一個環境，發現一條做得不好的步道，就像一條拉鍊把山剖開，破壞的力量還是無所不在。看到這種步道會很扼腕。」周聖心說明，即便挫敗一直存在，她也想過或許未來某一天，自己無法再上山下海勘查，因此希望步道運動可以傳承，由年輕人接棒，讓台灣的文化和環境的美麗代代延續。



體制外的高齡教育 故事裡看見可能性

林宗憲：「保持彈性，才能幸福地老去。」



撰文：吳心予 攝影：鄒毓凱

林宗憲，社會企業「搖滾爺奶」創辦人，培訓爺爺奶奶說故事能力，提供高齡者與社會雙向互動的機會。

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之中，可能缺少「如何老去」，很少有機會討論如何幸福地變老，或者年老是什麼樣的事情？從「故事島」到「搖滾爺奶」，林宗憲的創業關注由兒童轉向高齡族群，協助團隊中的中高齡成員藉說故事與社會接軌，台下聽眾也向爺爺、奶奶提問，交流關於「變老」的故事。

故事重燃生命熱情

林宗憲畢業於政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班，大學和碩班分別就讀臺藝大戲劇系及「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他認為，比起體制內教育多有標準答案，「故事沒有二分法」，充滿生命的可能性，因此他決定從體制外教育出發，以故事為媒介，實踐對教育領域的熱情。經營「故事島」說故事給兒童十年後，林宗憲感受到自己創意感的停滯，以及市場少子化等等的影響，轉而發現高齡者用到的長照資源並不多，仍有許多長者需要陪伴和照顧，「孤單也是門生意」，林宗憲分享。

「演戲要演給0到99歲的人看」，林宗憲延續過往的演戲經驗到「搖滾爺奶」的團隊中，即便兒童教育與樂齡教育關注的族群不同，在林宗憲眼裡，教育的核心相通，只是兒童和高齡者的人生課題剛好相反。小孩子太愛自己，需要學會理解他人，而高齡者往往花費許多心力經營家庭，容易忘記愛自己，林宗憲想協助他們跳脫框架。「搖滾爺奶」社會企業目前有42位爺爺、奶奶，他們分成小隊，在各處的咖啡廳說故事，並在10到15分鐘的故事結束後，接受所有聽眾對「變老」的提問，達成林宗憲所說，「彌補『教育沒有教我們變老』的空缺」。

比起幼兒園等等穩定性高、觀眾單一的展演環境，林宗憲選擇咖啡廳，因為聽



眾的年齡和反應都無法預期，他說明：「保持面對受眾的彈性，他們才有機會面對自己幸福的老年。因為不管環境如何，他們都有彈性適應環境的變遷。」林宗憲期待熟齡族群免於「退休等於退化」的生活，而是有能力安排退休後的豐富活動。原本在日商工作，68歲的「西瓜爺爺」有點嚴肅，他第一次看到小朋友跟熊說話的故事時，認為熊不可能會說話，教小朋友可以跟熊說話太危險了。林宗憲告訴西瓜爺爺，「故事跟科普事實不一樣，故事允許任何的神話、精怪，可以包涵各式各樣的想像。」在「搖滾爺奶」說幾次故事之後，「西瓜爺爺」不太嚴肅了，甚至開始開玩笑。他會摸著光光的頭頂問台下的小朋友，「猜猜我是什麼瓜？」，台下有小朋友大喊：「傻瓜！」。有次西瓜爺爺說起談論死亡的故事，台下的高中生則邊聽邊流淚。

真實交流的場域

「搖滾爺奶」的高齡者每次出外說故事都有薪水，且每兩個月都會參與培訓課程，學習透過正向心理學處理演出當下的壓力，以及更好的說故事技巧。林宗憲不會過度鼓勵爺奶們，期望破除社會普遍遵循的「敬重」價值。他發現，人們因為敬重長輩，常常不會將真實的建議或回饋說給高齡者聽，成為長者進步或與社會接軌的阻

礙。所以合適的心態是「尊重」，尊重每個人的處境與狀態，但不要因為「敬重」產生的距離感，而減少與高齡者真實交流的機會。

像是56歲的「蘿蔔絲奶奶」自我要求高，一直以來的表現也不錯，林宗憲便在媒體拍攝的場合讓蘿蔔絲奶奶演出。出於緊張，蘿蔔絲奶奶刻意展現的表演反而不自然，台下聽眾的反應並不熱絡。當天活動結束後，林宗憲把他當時，包含聲音、表情、互動，一點一點記下的建議，理直氣和地告訴蘿蔔絲奶奶。蘿蔔絲奶奶聽了非常傷心，當下邊聽邊哭，林宗憲選擇不打擾她的情緒。後來蘿蔔絲奶奶依然在「搖滾爺奶」說故事。陪伴和協助爺奶說故事的這段時間，也有爺奶因為不同的因素離開團隊，林宗憲表示祝福和感謝，他支持每個人的選擇。

跳脫「敬重」的規範與高齡者溝通，需要理性切換角色的能力。林宗憲坦言，「演戲的人很理性，我們知道我們在扮演這個角色，任何的外力、文化、氛圍……都不會影響你。」在與爺奶溝通的過程中，林宗憲用扮家家酒的儀式，破除敬重。「我那時候就是要扮演巧克力老闆，領薪水的人就要好好地扮演員工。」在組織中每個人各司其職，便能夠脫離社會中對高齡者過度敬重，而不敢提出批判性建議的狀況。林宗憲更清楚知道，他在僱傭關係中提出改善方案，是為了陪伴爺奶進步，並且一起提升和維護「搖滾爺奶」的品牌形象。

希望爺奶快樂長壽



「搖滾爺奶」的第一批成員，來自林宗憲在社大兼課，和在「揚生基金會」說故事班認識的高齡者。前來「搖滾爺奶」的爺奶們有的是退休後不知道要做什麼，或者因為說故事給孫子聽而產生成就感，想要說故事給更多人聽。還有白爺爺曾經在廣告公司上班，他發現自己很會說故事，因此加入搖滾爺奶。「我幫他們用故事嫁接社會，走入社會。」林宗憲希望爺奶學以致用、快樂地長壽。



經營「搖滾爺奶」的每一步，林宗憲緩慢而穩定地實踐創意想法，確定營運的收入穩定，再慢慢擴大組織。談及「搖滾爺奶」未來的樣貌，林宗憲規劃2019年開發20個課程和20個單位合作。林宗憲還觀察到常常是老年在照顧老老年，高齡陪伴的工作很少青壯年人加入，切合這個發現，他表示「搖滾爺奶」未來可能觸及「青銀共居」或者「共老宅」相關的計畫，與高齡者一起實踐他對人際交流的大膽想像。

了解真實議題 小草書屋伴孩童成長

林峻丞：「與孩子親近的關係是
最好的回饋。」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林峻丞，甘樂文創執行長，希望透過文創品牌解決三峽的在地問題，並且創辦「小草書屋」，陪伴弱勢學童。

「我的初心是甘樂文創當時成立的心意。看到社區的問題、想要解決，希望三峽變得更好，希望甘樂做的事情可以影響更多年輕人。」2010年林峻丞在三峽創立社會企業「甘樂文創」，關注三峽在地的社區議題，包含文化、環境及弱勢學童等等。

返鄉了解三峽

林峻丞在三峽出生長大，2006年返鄉，開始思考可以為家鄉做什麼。返鄉後，林峻丞慢慢結識社區的在地夥伴，居民、當地藝術家、文化工作者、藍染老師等等，他們陪伴林峻丞了解現今三峽面臨的困境。三峽正經歷文化凋零，少有年輕人在地紮根，社區過去也沒有名聲響亮的特色產業，加上老街商業化、新舊城區對立及毒品治安的問題，讓在地人對此十分憂心。

構思解決方案之前，林峻丞在社區蹲點，透過跟社區夥伴參與在地，認識真實的社區議題。「確認問題存在，同時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跟發現，才有辦法跟這些議題結合。」，林峻丞說明。以河川污染舉例，林峻丞和夥伴看到河川因為工程整治而充滿垃圾，便不斷向當地的居民詢問，像是鄰居阿伯告訴林峻丞，「這個河川每年都在挖、河裡面很髒」，代表這個議題是居民的共同感受。接著林峻丞推動環境保護活動，希望藉此喚起當地人對河川的關注。經過討論，林峻丞和夥伴每個月第二個禮拜二固定發起淨溪活動，用創意有趣的方式進行，想要以長期的革命運動，看到期待中的乾淨河流。

從當地人口中觀察三峽的境況後，林峻丞構思從藝文展演空間出發，改善社區現況。甘樂團隊改造老屋，舊房子變成在地文化的舞台。林峻丞表示：「有了場域之



後，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空間中舉辦音樂活動或旅遊文化推廣，希望吸引更多人來到三峽，同時將三峽多元的面貌傳遞出去。以這間裝修後的老房子為起點，林峻丞的想法逐漸發酵。

小草書屋陪伴弱勢孩童

2016年，林峻丞在三峽成立「小草書屋」，提供社區弱勢家庭的孩子課後照顧和職能培訓。林峻丞表達：「希望社區的孩子都能看到機會，每個人該有自己的位置。每個孩子都不應該被放棄。想要透過體制外的陪伴和教學方式，帶給孩子更多的成長或改變。」透過長期經營，林峻丞看見孩子的成長與改變。

曾經有一個家庭，媽媽過世、爸爸入監服刑，六個兄弟姐妹中，大哥跟二哥中輟，所有的經濟負擔都在大姐身上，大姐只能到酒店上班。林峻丞和夥伴決定輔導大哥就業，先是提供他工作機會，但是發現大哥初期的工作態度不佳，需要每天打電話叫他起床，有時候手機關機，讓甘樂的夥伴很挫折。有些孩子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和輔助來適應工作，但是很多人在上軌道前就被貼上標籤，被他人放棄、也放棄自己，但是林峻丞堅持「真心去帶他、花時間等待」。過了一年半，大哥遲到次數漸漸減少，

變得自信許多，現在是豆腐店的小師傅。原本高中生年紀的大哥，作息不正常，需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現在大哥發現不依靠藥物也能睡得好。家裡弟弟、妹妹隨著哥哥的狀況穩定，生活變得安定。

孩子對林峻丞說：「峻哥像爸爸一樣。」對林峻丞而言，陪伴孩子的過程中，與他們親近的關係是最好的回饋，他感受到被孩子信任，因而堅定的相信，「每個人都有機會，只是有沒有遇到對的人。有沒有遇到對的人、對的方式，這些很重要，這些條件要具足，才看得到改變。」

面對無力感 接受肯定

社區中每個方案的推動，都需要長期間付出心力，林峻丞坦言，過程中難免出現無力感，特別在營運方面一直存在巨大挑戰，由於甘樂的商業模式尚未非常明確。推動社區工作的初期，甘樂資金並不充裕，為了支付老屋龐大的修繕費用，林峻丞向銀行貸款，並且思考其他收益方式。加上推動組織制度改變，需要等待夥伴跟上，以及部分工作的進展不如預期，無法控制進度的壓力讓林峻丞感到無力。遇到瓶頸，林峻丞選擇分析和面對問題，他知道如果只聚焦在自己的情緒，問題沒有解決，只會帶來更龐大的無力感。

甘樂的工作也帶給林峻丞許多成就感，像是發現台灣還沒推廣社會企業的概念時，甘樂已經走在社企的路上，或者近一、兩年，「地方創生」的內涵逐漸廣為人知，許多單位邀請甘樂團隊分享做過的方案。這些正向鼓勵讓林峻丞發現，原來甘樂走得很前面，而且走在對的路上。

談及創立社會企業，林峻丞認為，「要真的很勇敢，因為在走一條別人不願意的路。」社會企業時常旨在解決政府和民間團體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需要兼顧創新和營收，非常不容易。經營甘樂文創，林峻丞一直很堅定。他的堅持來自於時常回憶初心，他也讓夥伴在加入時寫下初衷，當困境和生活瑣事消磨熱情時，能藉此找回前進的力量。

面對團隊的未來，林峻丞未設下限制，「就像甘樂的信念I can do it, we can do it, you can do it，我們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做到什麼都可以，這條路就隨著老天的安排，因為一定會有些契機，時間點來了，我們就抓緊把握，把事情最好、做對。因為人生本來就不受限，不侷限自己的人生，才有更大的可能。」



社會教育最重要的 就是「翻轉」

紀惠容：「只有教育才可能深入社區。」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紀惠容，現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學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也是 Valparaiso University 音樂碩士。她致力於婦女人權運動，不僅是「反雛妓運動」重要推手，也帶領勵馨基金會夥伴，促成臺灣法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誕生。

1993年，紀惠容進入勵馨基金會服務，擔任「反雛妓行動專案」主任。最初，勵馨只有中途之家，收容因故無處可去的少女。「後來我覺得，這是在補社會的破網，但我們想到上游看看，是誰在製造雛妓問題？」紀惠容認為，「補破網」並非長久之計，應該去研究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於是，她決定從反雛妓社會運動做起。

第一響：反雛妓運動

原先，基金會要即刻舉辦反雛妓慢跑運動，但紀惠容認為應先暫緩：「先讓大眾知道『勵馨』，才可能進一步理你。」她畢業於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來到勵馨前，已經當了七年的記者，擁有許多媒體資源和人脈。

當時，紀惠容透過上電視、舉行記者會等等，取得媒體發聲權和解釋權；也寫信給第四台，請他們播廣告短片。由於擁有相關人脈的緣故，當時許多宣傳文宣和廣告都得以免費印製、發放和播映。紀惠容試圖讓整個社會知道勵馨正在努力的事，也讓大眾了解雛妓問題，成功引起眾人關注，將勵馨行銷至臺灣各地。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紀惠容評估1993年底即可舉辦「反雛妓路跑」。除了民間力量外，政府也樂得看見臺灣自主興起反雛妓力量。原先，政府不認為雛妓問題嚴重，紀惠容於是開始策略研究，著手進行「臺灣雛妓問題大小推估」。最後，計算出在台約有6萬位雛妓；除了量化研究外，她也進行質化研究，直接訪問孩子，雖然訪問內容不一定全面，但終究有其參考價值。



「路跑當天，幾乎所有媒體都到場了。」有一件事讓紀惠容印象相當深刻和感動：慢跑運動結束後，一位女孩來信，她說自己邊跑邊掉淚，因為過去在華西街時，她覺得全世界都遺忘自己；參加慢跑後，她非常驚訝也激動，居然有這麼多人支持這個議題。

社會教育，可以理性，更要感性

勸馨的動員策略，一是媒體，二是教育。「只有教育才可能深入社區。」紀惠容認為，要徹底改變文化和思想，必須進入學校和社區。除了較嚴肅的座談會，他們也嘗試用戲劇、行動劇……方式，進行倡議和宣導。

「勸馨更著重於運用感性的策略。」紀惠容說，「少數人可以透過理性來辯論，但多數人無法這麼做。必須讓大家直接有感官衝擊，引起情緒和動機，才可能讓他們有下一步行動。」

勸馨在立法院面前演行動劇：由少女穿上粉紅色塑膠袋；扮演嫖客和人口販子則穿著黑色的塑膠袋。以紙做的鎖鏈將少女綁起來，再用一把上面寫著「法案」二字的

寶劍，把鎖鏈砍斷。模式非常簡單，但因為畫面具強大戲劇張力，足以讓這件事在隔日躍上報紙頭條。紀惠容不斷奔波拜訪相關人員，更在電台呼籲大家重視這件事，集結民眾力量。立法院面臨社會壓力，終於開始有所作為。就這樣，〈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在兩年後出爐。

除了立法院，紀惠容也舉辦遊行，把行動劇搬到街頭。那時候，遊行隊伍裡，有穿著新娘禮服的人，也有人口販子用推車載著小孩；請來舞者進行舞蹈表演，讓他們不斷吃饅頭、吃到噁心，隱喻那些性工作者須不斷接客，已超出身體和精神能負荷的程度。「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啊！我們不是靜坐抗議或綁布條在頭上，而是讓大家從感官、視覺和情緒，去體驗孩子處境，感受更深刻。」紀惠容說，遊行或戲劇的說服力，也遠比舉辦專題演講來得有效許多。「做社會運動，某些程度上，也要『好玩』，如果你覺得不好玩，你就會很累，然後後繼無力。」

一點一滴，淵遠流長

紀惠容作為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特別想和大家分享，在這些年來學習到的「領導人」課題。首先，你必須對自己要做的事很篤定、很有熱忱。你的熱情和堅持會影響到團隊裡的每個人，帶領大家和你往同一個目標走。另一方面，你得懂得如何進行團隊合作，並培養良好的溝通能力。「我以前『沒有耳朵』，總是霹哩啪啦一直講，想把所有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告訴大家。但這樣很糟糕，因為只是單向溝通。」有次開會後，大家不歡而散，經過當時副執行長的提醒，紀惠容才領悟，應好好聽別人講話。「不能只是你一個人往前走，然後其他人都沒跟上。」紀惠容笑著說，帶領一個團隊，圖的是長久。

「社會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翻轉』。要怎麼透過傳播理論或社會理論去改變社會？是我那時候不斷思考的。」紀惠容表示，一種習慣、態度或價值觀的養成，已是根深蒂固，只能設法以策略對其進行改變。她認為，新聞媒體是「拆毀」，透過報導和傳播，讓一個事件曝光，被眾人看見；非營利組織則是「解構」再「建構」，對一個議題進行分析，進而設計方案、找出解決辦法。



她也說，想要做好社會教育，一定要有社會學的底子；如果沒有一些社會學的背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而戰，也看不清楚結構，更無法解決問題：「我自己是

學社會教育，但我私底下進修很多社會學理論，也讀了一些左派的書，替自己補足知識。」

紀惠容建議年輕人們，應該培養思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可以參加「哲學星期五」等等講座，發掘不同思維，拓廣視野，不要侷限自我。她也鼓勵，大學生利用一到兩年的時間，到非營利組織實習：「你的生命會變得不一樣。你會看到很多弱勢，你會去思考為什麼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將來如果賺了錢，你就會想到社會責任。」

「只要說『我想做』，就會成。不想做，就很多理由。」紀惠容認為，自己受社會教育學系影響深遠。她說，如果想讓社會翻轉或產生變化，內含許多文化、政策以及人的問題。「很感謝社教系，讓我知道我們持續努力的，是為了讓社會產生改變的影響力。」

翻轉刻板印象 參與在地生活

張靖姿：「萬華土地會黏人。」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張靖姿，萬華社大副校長，目前亦就讀台灣師大社教系博士班，曾任萬華社大課務專員。

「喜歡一個人也是這樣子，一開始好討厭這個人，後來發現這個人還不錯，感受更明顯。」張靖姿說起萬華，笑眯了眼的樣子，幾乎是敘述相愛多年的戀人。大學畢業後當記者，接著讀生命教育碩士，現在張靖姿在師大社會教育學系就讀博士班，也是萬華社區大學副校長。

意外進入社大工作

碩班畢業後，張靖姿想轉換跑道，因此瀏覽求職網站。她原先沒有考慮到社區大學工作，但網站不斷跳出萬華社大的課務專員工作資訊，加上當時的副校長在網站上看到張靖姿的履歷，主動寫了一封email邀請她前來面談，張靖姿在面談中發現，社大工作很有趣，也很適合她，便決定接下萬華社大的課務專員的職務。

在社區大學工作，每天都會遇見各式各樣的人，而張靖姿喜歡與人互動、觀察人生百態，加上她對在地文化有感覺，所以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很適合這份工作。然而，當張靖姿從課務專員剛升上副校長不久，曾有一位中年男性學員走到社大的辦公櫃檯，態度強烈地要求退費。此時課程已經開始進行，工作人員依規定告知退費的金額，但那位學員認為他只是比規定截止日晚幾天辦理，所以應該能夠退更多的學費。雙方僵持不下，張靖姿出面處理。她向學員說明狀況以後，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她都面色平靜地聽學員說話，包含言語攻擊。幾天後學員再次出現那天，他只是默默低著頭，填完退費需要的資料。

回顧高中時期，張靖姿雖然讀的是明星高中，卻在課業方面遭遇挫折。隨著升上大學、從事記者等等工作，她開始學習自我認同，並且包容社會上人、事、物的多



元面貌。「生活裡面所有問題都能解決，最難處理的是人心。」張靖姿說道，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有不同類型的人，在社大辦公室常常收到學員送來的點心，也遇過衣著華麗，卻抱怨課程收費太高的居民。她用平常心看待這些變化，認為多變的情況都很有趣，她在用心感受和情緒平穩之間，得到舒適的平衡。相比以前工作掏空熱情，在萬華社大，張靖姿反倒認為現在每天的工作都有很多進步。

是副校長也是學生 多重適應轉換

當然，社大工作種種的變化，也曾讓張靖姿花費心力調適。升上副校長以後，張靖姿十分不適應新的身份。副校長職位不再與同事平行，讓她感到不習慣。同時，張靖姿也是萬華社大小提琴課程的學員，她私底下和老師說，「在課堂上我就是一般學生」，不希望得到特殊待遇，但是如果課堂中有其他學員認出張靖姿是副校長，她便會不太自在。張靖姿還分享到，由於時常遇見其他更資深的工作者或同事，她認為，「擔任副校長不是多了不起的事情。面對你、我都不會的狀況，我們一起想辦法。」這便是她在同事關係間尋見的新關係，工作過程和閒暇之餘，和同事的互動依然融洽；但在外人面前，她得回到副校長身份，處理事務、代表發言等等。

面對過去歷任副校長的做法，張靖姿不僅面對承接過去的期待，還不斷想辦法創新突破。在處理社大的例行業務時，她會傾向依照過去行之有年的慣例做事；但是在其他時候，她就可能跳脫過去的框架，做自己認為對的決定。此外，究竟哪些新課程應該努力促成？哪些課程又要踩煞車，也是顧及社大全面狀況時，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雖然每位課務專員都會希望課程成功開設，但是報名狀況便是最直接而有效的需求調查，若是上課人數不足，考量社大有限的資源，便可能關閉該課程。

公民參與融入課程

雖然各類課程是否開設，人數不是社大的唯一考量。深入探討社大課程在社會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公民參與」是重要元素，但如果課名直接出現「公眾議題」等等看似困難的字眼，絕對會讓一般民眾望之卻步。「所以我們要用誘拐的，用糖衣包裝」張靖姿笑著說。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張靖姿與工作夥伴，便會將有趣的課程融入公民行動。

公仔班就是一個成功誘拐的故事。加入「在地參與」的第一堂公仔課，為了讓學員用黏土做出「剝皮寮一條街」，老師要求學員實際走訪剝皮寮，然而學員起初並不願意。老師便自行拍攝照片帶回班上，並展示自己做的一棟建築及考究細節的過程。同學們看到後馬上表示，「老師，你這個很厲害欸，我也要做一棟」。接著老師告訴學員不可以跟我做同一棟樓。於是同學們實際走進市場，開始一連串的發想與觀察。不只是蓋房子，老師還跟大家討論，在他們蓋出來的空屋模型裡放進攤商，就能讓公仔進到建築裡。第一期的成果展受到媒體採訪，到了第二期課程，一開始學員就問老師，「我們什麼時候要去踏查？」



「你要愛自己的家鄉，它才會存在。」

張靖姿的工作不只接觸學員，也和社區居民及其他在地團體密切往來。認識萬華社區前，張靖姿跟其他外地人一樣，都對萬華帶著治安不好等等負面印象；然而深入瞭解之後，卻發現眾多負面標籤的另一面，有著溫暖故事。像是街友聚集看似混亂的現象，事實上也代表萬華的包容力。和善的居民，加上傳統大廟或長期進駐的公益團體，為街友提供充足的食物來源，才造就現今的景象。「這裡很吸引人。」深入了解萬華，前後帶給張靖姿的反差感，讓社區中的美好更顯珍貴。雖然張靖姿家住新北，但她對萬華的了解愈來愈深，甚至超越自己居住的社區。「萬華的土地會黏人。」從張靖姿笑著說，有次她問當地居民，我可不可以自詡「艋舺人」？「好啊好啊！」他們毫無保留地歡迎。「你要愛自己的家鄉，它才會存在。」張靖姿眼中的萬華，不只可愛，也有著豐富的生命力，而她在社區裡成為「艋舺人」，與社大夥伴繼續為在地文化耕耘。



讓學生能發自內心感受到自身和社會的關聯



楊志彬：「擁有學習動機，你就會主動尋找方式來解決。」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楊志彬致力於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大學教育，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也曾任職於北投社區大學和文山社區大學，同時亦為暨南大學水沙連行動的發起人。

水沙連大學城：讓學生走入在地

楊志彬先前在國立暨南大學任教，期間，他推動「水沙連大學城」。「水沙連」是埔里鎮魚池鄉一帶的古地名；大學城則是大學和社區的新型態，兩者互相支持與合作，關係更緊密。首先，楊志彬在進行課程設計時，即思索該如何讓學生走出校園，進而投入社區，例如：學校原有的大一新生「春跑」，原先是繞著學校跑，那一年，他將場域擴展至社區，讓學生們繞著社區路線跑一圈再回到學校；他也鼓勵學生們搬到埔里鎮上住，不要只住在學校宿舍，而應打開心胸，和埔里在地居民互動。「要先讓學生對埔里感興趣，他們才會有動力投入埔里事務。」楊志彬說，應讓學生能發自內心感受到自身和社會的連結，從了解埔里鎮開始，進一步欣賞其自然和人文特色，再接著關心在地問題，規劃得以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

時機成熟之後，楊志彬開始籌組水沙連大學城辦公室，他召集許多有熱忱的學生，先在埔里民宿培訓他們，並讓埔里在地居民和這些年輕人們變成合作夥伴，雙方產生良好的革命情感。此外，他也成立了「水沙連電子報」編輯團隊，每個星期都推出電子報，記載埔里在地人事物，讓鎮上的故事得以被推廣，同時也能吸引更多學生加入「水辦」的行列。楊志彬表示，之前學生大多覺得學校附近無聊，但其實埔里鎮物產相當豐富，例如：皎白筍、香菇、酒等等特產。另外，在人文發展上，也極具特色，許多藝術家自營畫廊，也有藝術創作者齊聚的手作市集。楊志彬鼓勵對藝術產業充滿熱忱的學生到畫廊實習，不僅減輕藝術家的負擔，也讓自己得以多一份學習經驗。



「只要你真心覺得一件事好玩，什麼都有可能。」楊志彬笑著說，「年輕人什麼都不怕，只要心眼打開，他們的學習力是很強的。」他分享，當時，埔里市場二樓約有500多坪的空間，卻已荒廢十幾年，楊志彬希望能善用這個社區場域，因此要求學生們在該處舉辦水沙連大學城的成果展。這個任務並非易事，但學生們還是義不容辭地設法執行。光是清洗地板，他們就耗費不少心力和時間，然而由於彼此擁有共同目標，即使過程很艱難，學生們還是辦了一場別具意義的成果展。

拉近社區與年輕人的距離

除了曾在大學任教，楊志彬也曾在社區教育領域耕耘數十年，知道如何以社區能理解的語彙，邀請在地商家、居民進入大學場域。「我以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待在社區的經驗，所以我懂社區，知道怎麼和他們溝通。」當他在帶領暨南大學學生時，設法讓學生從學校場域進入社區，思考如何在大學創造不同氛圍，並仔細觀察學生們的轉化和成長，讓年輕人的能量和社區原有條件自然地交織在一起，激盪出更多元的東西，讓學生和社區得以共存共榮。

楊志彬也提及帶領社區大學學員和大學生的差別。例如：社區大學的學員們以

中長輩為多，他們一路走來已累積不少社會經驗，其中或許有一些是創傷和難以改變的價值觀，較不容易改變。假設在暨南大學，大約兩年內，就能讓楊志彬預計創造氛圍和環境發酵；在社區大學可能要花上五、六年，而且還不容易看到成果。面對年輕人時，可以用創意好玩的方式來方法，也可以稍微冒一點險。有一次，上課地點在交通不便的某個廟，學生問楊志彬如何前往，楊志彬只回了一句話：「你是大學生了，自己想辦法。」最後，有些人選擇搭計程車共乘，也有人直接走路去，整整花了一小時。「位置不同，條件不同，遇到的對象也不同。我必須有所改變，這就是『以人為本』。」楊志彬說，他應該調整自身心態，能加快時加快、該放慢則放慢，從受眾的不同需求中，找到最適合的方法和模式。

年紀很輕，能做的事也很多

「在埔里，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很容易進到某種專業領域，上手時間比想像中更快，當他有學習熱情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沒那麼難。」楊志彬認為，社會教育和這件事道理亦同，生活中處處是社會教育，但須思考其吸引人或不吸引人的原因。「如果你真心想讓這個領域更好，你就會主動去找方式解決。」最後，楊志彬鼓勵年輕人們，應對自己有信心，不見得要亦步亦趨跟著主流價值，設法增廣見聞，走出最適合自己的路。

楊志彬認為，現今大眾普遍對年輕人的學習力沒什麼信心，認為年輕人仍應按部就班行事：「以前都說年輕人要『蹲點』，一蹲就是好幾年。你要慢慢來，像學徒才能出師——但事實上，根本不是如此。」他說，年輕人的成長往往比想像中更快，當他們極具學習熱情時，其實任何事都沒那麼難。「到底要蹲點多久，應該讓他們自己評估自身狀況，決定品質要到什麼程度」。此外，他也說：「很多人都覺得要讓年輕人返鄉，但他們那麼年輕為什麼一定要返鄉？他們為什麼不能出國？為什麼一定要留在臺灣？」楊志彬認為，年輕人想要的是能夠平等選擇的機會——他返鄉和留在城市受到的待遇一樣，「在他們人生最自由的階段，必須讓他們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社會教育應該很活潑，而且很貼近生活。」指著牆上許多博物館的照片，楊志彬說，這些社教場域，有很多人連去都沒去過。為什麼我們投入這麼多社教資源，但大家都不感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嗎？還是主事者沒有好好地規劃與傳達？他拋出這些問句，讓我們思考。接著，楊志彬話鋒一轉，勉勵社會教育學系的同學們，應該要對自己充滿信心：「你想讓這個領域更好，擁有學習動機，你就會主動尋找方式來解決。生活中，處處是社會教育。」



創造的社群正是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楊喬安：「只要創造機會給他們。」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楊喬安，「玖樓 9floor 共生公寓」社群經理。畢業於臺大財金系，卻沒選擇往金融領域發展，而是投入新創產業的社群管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

人和人的連結

「『玖樓』和『人』的關係密切。」楊喬安熱愛這份工作，因為他喜歡和人的深度交流與接觸。

楊喬安談起自己當交換學生的經驗。當時，他初到德國，人生地不熟。「我準備開始過生活，卻不知道怎麼過生活。」在地人的網絡全然不見，連要採買生活用品，都不知道該往何處去。玖樓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替室友——玖樓對房客的稱呼——建立起人際網絡。尤其對外國室友，楊喬安更能設身處地。他也說，身為社群經理，能在短時間內，碰到許多不同國籍或職業的人，相當有趣。

大學時期，楊喬安參加漁村服務社，於寒暑假到澎湖服務。除了帶小朋友營隊，也進入社區服務。他認為，現在在做的事和當初類似，較特別的是，場域從鄉村換到都市，人的組成和互動方式也不盡相同。「在漁村，你可能直接進到別人家去跟他們聊天；但都市門窗緊閉，所以換我們自己要打開來，這也是玖樓的宗旨。」

玖樓所創造的「社群」，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喜歡衝突，但成了社群經理

身為社群經理，楊喬安是和所有室友最親近的角色。入住時，房客通常會和社群經理會成為 facebook 好友，房客可以透過 facebook 直接和他溝通。他要協助新房客融入公寓環境和生活，也要不定時關心他們是否適應。如果房客發生一些問題，楊喬安也會幫忙解決和處理，但仍以讓房客自發性地解決為主；如果真的遇到需要中立第三



者的情況，再由他介入協助，例如：房客們對於清潔的標準時常不同，這時候，就需要社群經理來進行協調。

當房客們彼此不熟時，就顯現社群經理角色的重要性。「為大家牽線之前，要先知道每個人的個性，有些人外放，有些人害羞。」楊喬安會根據個人屬性不同，以各種方式讓大家融入群體，例如：讓活潑的人帶動團體氣氛；個性較安靜的人，可能就要讓他們先從一對一互動開始。「會住進玫樓的人，某種程度就已經是願意融入社群的人，心態本來就比一般人開闊，只是需要創造機會給他們。」楊喬安說。玫樓會不定期舉辦許多活動，包含烤肉派對、露天音樂會、講座等等，提供房客們許多交誼活動的可能性。

楊喬安和我們分享他遇過最棘手的問題：有一間公寓在師大夜市裡，七樓頂樓外面就是露台。室友和朋友們會在那裡聚會聊天，於是有鄰居打電話向他抗議。當時鄰居覺得太嘈雜，但室友覺得自己已經盡量降低音量，事件成了羅生門：「我還親自跑去，蹲在樓梯間，聽噪音到底大不大。」楊喬安笑著說。

社群經理和人際連結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對楊喬安來說，這是他喜歡從事這份

工作的原因，但有時候也是一定程度的負擔。「心理素質要提升！我的個性，本來就是不喜歡衝突，何況常常要當和事佬、處理別人的人際關係衝突。一開始，很困擾，因為自己情緒容易受影響。但做久了就習慣，也摸索出一些抽離的方法。」楊喬安說，自己遇到這種困境時，會嘗試換位思考，也適時轉念，盡力即可。「我的工作和生活是連結在一起的，現在有時候就讓自己部分抽離。」楊喬安偶爾會在假日時，去爬山踏青，重新蓄滿能量，再持續投入工作。

新創產業的美好與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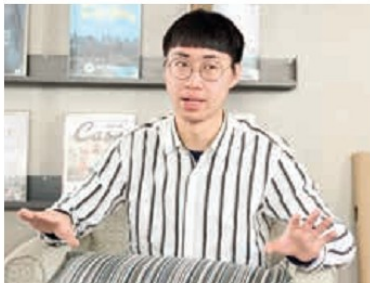
「在新創公司工作，你可以明顯看到它的成長和進步。」當初，楊喬安中途去當兵，短短四個月，玖樓已發生許多事，包括開始和公部門合作、金流系統上線、公寓數增加至七、八間等等。「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和公司是一起成長的。」

楊喬安認為，新創產業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可以很自在地做事，自由度大，能發揮的創意也多。再加上人數較少，因此每個人都有機會代表公司，對外進行呈現或簡報，藉以訓練表達能力與應對進退的處事之道。

「新創公司不像別人已建立SOP，你無法把事情處理到百分之百，但你可能可以先做到60分，再慢慢愈做愈好。」楊喬安舉例，例如：以帶室友入住而言，若發現在解說當下室友可能聽不懂或出現迷惘神情，就可以立即進行事後檢討，並在下一次帶室友入住時改善。自由度高，當然也有必須承受的壓力。新創不像大公司，工作由別人指派，因此，當可以自己決定時，相對地也要為它負更大的責任。

多元學習與職涯選擇

楊喬安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商管背景出身的他，沒選擇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走入金融業，反而是投入新創公司。「當初念財金純粹是因為『不排斥』。台大選課很自由，我盡量去外系上課，累積不同興趣和領域的知識。」除了較有興趣的社會科學外，他笑著說，自己也曾經到師大修習碩士班的餐旅管理相關課程，實際進入飯店進行產學合作。



當時，他修習社會學系開設的「公共社會學實習」，因緣際會下，到了「9floor 玖樓共生空間」實習兩個月。那時候，玖樓仍屬草創階段，

甚至沒固定的會議時間。「我還常常不好意思地詢問：『請問今天有要開會嗎？』」憶起過往，楊喬安笑著說。這份實習經驗，為他帶來什麼收穫呢？他表示，自己在大四下，參加大數據商業競賽，負責統整和商業策略發想的工作，相較於以前，自己已經能從容自在回答評審提出的問題，語句也較有邏輯性，都有賴於在玖樓實習的磨練。

楊喬安的職業選擇和所學沒有直接相關，家人也曾多有疑慮，尤其長輩較難理解「新創」概念：「年代不同，對他們來說，以前可能找到一間公司，就會在裡面工作十幾年，甚至一輩子。」面對家人的質疑，楊喬安選擇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溝通，盡量不起正面衝突。現在，玖樓已頗有名氣，為大眾所知，許多媒體也前來採訪或報導，對楊喬安而言，這樣的肯定，成為他對家人證明自己的方式。

他分享自己認為大學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解決問題，二是邏輯思考。「可以的話，大學多去涉略有興趣的事物，不要被系所限制。邊走邊看，邊做邊學，我的人生也是這樣，碰到什麼就去嘗試看看。畢竟，你怎麼能臆測未來會遇到什麼事、擁有怎樣的目標和心境呢？」

提供弱勢就業機會 食藝的社企之路

鄭惠如：「員工相處像家人。」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宇

鄭惠如，畢業於「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碩士在職專班」，曾獲選為亞洲 30 歲以下最具潛力傑出人士，現任食藝餐飲公司執行長，食藝以社會企業形式協助弱勢就業。

從「家扶」看見需求 食藝是第二個家

「食藝」正式成立之前，鄭惠如的餐廳已經跟「家扶基金會」聯繫。後來「食藝」的共同創辦人曾是「家扶基金會」的社工師，現在轉為任職「食藝」的人力招募部門，他在工作中發現很多受扶家庭的子女，畢業找工作時，常常因為學歷或家庭背景，而無法進入大部分職缺的第二階段面試。鄭惠如認為，餐飲工作適合沒有相關資歷的人，只要願意學習，工作都可以上手，也能以此獲得穩定的工作職位。

在鄭惠如心中，「食藝」是第二個家。每間店面開幕後，「食藝」都聘請當地員工，總公司會輔導部分員工成為主管，直到培訓主管擁有領導能力後，才會放手讓主管獨立帶領店內員工。這些合作和輔導的過程，建立起「食藝」團隊的革命情感，鄭惠如說：「我們跟員工相處的方式都像家人，有困難可以直接說，在公司裡面也沒有喊職稱，他們會直接叫我惠如或惠如姐，如果你問我們員工執行長是誰，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是誰。」

即便喜歡幫助他人的感覺，鄭惠如經營「食藝」的這段時間，仍有無奈的經驗。「食藝」如果有職缺，都會優先發文給NGO組織或就業輔導站。如果是NGO組織中需要工作的個案，「食藝」的招募單位，都會跟個案的社工師先行聯絡，確定個案的狀況適合且具有工作意願，才會安排後續面試。但是就業輔導站的應徵者並無社工師輔導，因此面試時，遇到一些其實不想工作的應徵者，他們只希望集滿三間公司的不錄取，就能申請救助金。「遇到這種就滿疲乏的，因為安排面試需要時間、要找主管有空的時候，主管也需要準備資料，時常碰到這樣的問題，就會空忙一場。」鄭惠如說明。



鄭惠如初期的餐飲事業，是開在碧潭風景區的餐廳，但是遇到房東惡意閉店。為了度過沒有店面的危機，同時維持營收和避免員工失業，鄭惠如創辦網路品牌「幸福食品」，其中的一項商品「小三起司」因為媒體報導而爆紅。她笑說，那段時間沒有店面的廚房可以使用，工作的地點便是家中的廚房。「我們家就像一個小型的工廠，連大小包裝我們都自己做。」鄭惠如分享。經營網購品牌的時期，她同時規劃未來設立連鎖店，並與百貨業者洽談駐點合作。接著，鄭惠如創辦「食藝餐飲公司」，以社會企業的形式幫助需要就業機會的弱勢族群。

社教出發 連結社會資源

進入社教所並創業之前，鄭惠如在校內外生活中，體會人際互動的影響力。大學時候的鄭惠如熱衷社團和志工活動，加上主動到業界實習，她的行事曆填得很滿，同學都叫她「奔跑中的惠如」。在志工活動中，鄭惠如發現自己很喜歡與人互動，甚至因為幫助他人而獲得莫大的成就感。後來她才知道這些是成人教育的範疇，從師大工業教育學士班畢業後，鄭惠如進入社會教育的在職專班就讀。

鄭惠如表示社教系社會資源相關的課程，帶給她極大的幫助。像是課堂上提到

「中小企業網路大專平台」，平台上提供非常多職業技能的講座或學習資源，為「食藝」省下許多架設網站、開設課程等等的經費。此外，鄭惠如發現新進員工初期工作時，常常遇到不熟悉流程的困難，而原本發放的紙本講義不易理解，因此她使用「中小企業網路大專平台」的企業專區，請各分店主管拍攝工作SOP影片，交由總公司後製、上字幕，將公司員工的帳號加進來，即可觀看公司內部的教學內容。員工認為，影片教學好像身邊隨時有老師，方便他們立刻觀看或下班後複習，對學習他們很有幫助。

熱心公眾事務 把握所有機會

鄭惠如知道資源連結的力量，將之應用在生活中。在社教所就讀時，鄭惠如熱心於班級事務，也樂於協助別人解決問題。有一位同學經歷家暴困境，即便沒有經濟能力，但是礙於名下有房產，聯繫許多社福機構都碰壁。鄭惠如知道之後，轉介家扶基金會的資源給同學，現在那位同學已經運用家扶資源，與小孩一起在其他地方生活。這個經驗讓鄭惠如深刻體會資源連結的力量，「很多事情的處理都是資源的連結欸，要是我不認識家扶中心、不知道同學家庭的狀況，我就不能幫她找到資源。」

大學期間，鄭惠如參與社團、志工活動，鋪陳後續的實用經驗。「不要拒絕機會」，鄭惠如分享大學時擔任畢聯會公關，當時畢聯會需要二、三十萬元的募款，他們做了許多行銷推廣都成效有限。同時，鄭惠如和夥伴拜訪許多企業，一位補習業董事長一口氣捐出二十萬元。「我後來回想，覺得這個董事長好像要不要贊助無所謂，就是要看個人的特質，後來還問我要不要去出版社上班。」鄭惠如回憶，當時遇見的董事長在意的並非贊助金額，而是學生的個人特質是否積極。



「食藝」成立後，鄭惠如受邀前往美國的創業高峰會，她知道教育部青輔會可以申請計畫，如果通過就能得到機票補助。但是計畫的申請必須透過學校，不只需要列出計畫與目標，回國後來要辦理記者會。鄭惠如大學時因為「孔子行腳」活動，認識師大公關室的胡老師，便請老師幫忙聯絡學務處申請計畫，同時洽談回國後的記者會辦理。「還好我之前認識胡老師，『食藝餐飲』也才被那麼多人看到。」鄭惠如不斷連結人際資源，到現在經營社會企業，也持續關注企業中的人際網絡，拓展公益理念，並將「食藝」變成團隊成員的第二個家。

走過博物館逾十年 推廣文化平權

羅欣怡：「我找到一個可以感動自己的事物。」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羅欣怡，師大社會教育系博士，專注博物館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蘭陽博物館籌備處、台灣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現任「全聯善美的藝術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從感動出發 參與地方博物館運動

「我找到一個可以感動自己的事物。」現任「全聯善美的藝術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的羅欣怡說，「博物館工作令她從中找到意義與價值。」在羅欣怡眼中，傳藝中心是「社會教育的大現場」，展演活動發生在教室之外，透過社會教育的方法跟民眾傳遞傳統藝術的價值，所以羅欣怡的工作其實都是社會教育的一環。包含展示和推廣民俗藝術，每一件事情都是為社會教育而付出。

羅欣怡第一份工作是在縣政府「蘭陽博物館籌備處」，1996年籌備蘭陽博物館的同時，縣政府不只規劃烏石港本館，同時進行宜蘭的「地方博物館運動」，幫助許多在地的公、私立博物館，協助的對象除了有理想的個人，也可能是想要保護在地文化的小群體。透過召開「博物館家族」第一次的會議，羅欣怡向大家諮詢想法，並說明現在推動的「地方博物館運動」，邀請到三、四十位的夥伴參與。參與者表示，「很高興有這樣的活動，因為當時的資訊不易流通，許多博物館工作者不知道如何擬定方向，也不確定執行得是否正確，因此樂於有個諮詢團隊加入支持。」羅欣怡回憶，這段時間大家就像一個家族，交流和互動密切，隨後成立「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組織運作至今超過十年。

推動文化平權 理解身心障礙者需求

2008年，羅欣怡來到文化部所屬的「台灣歷史博物館」服務，致力於推廣文化平權。「親近博物館我們覺得很容易，但是沒有想過很多軟、硬體，已經無形地拒絕很多人。」羅欣怡說明。博物館內的樓梯設置可能阻礙肢體障礙者行走，或是文字說明



太過艱澀，阻擋心智障礙者接收新知。因此「台史博」推動「圓夢計畫」，認為每個人一生都有機會親近「台史博」，主要對象包含偏鄉學童與身心障礙者。

推動文化平權時，羅欣怡透過「中華民國智障者家庭總會」、「行無礙」等社福團體，了解心智與肢體障礙者需求，同時邀請他們實地適用展館設備。曾經一位坐輪椅的朋友來到「台史博」，發現無法靠近觀看望遠鏡的展示櫃，因為展示櫃下方的台子會擋住輪椅，望遠鏡的高度也不適用於輪椅人士。當初設計展示台時，羅欣怡原先沒想到這個問題，「透過他們的眼睛，才能看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便將設施拆重做，處除阻礙輪椅的台子，再將望遠鏡改成調降式高度，再次邀請那位輪椅人士前來觀展。「他就很感動，跟我們說，自從小學坐在輪椅上之後，幾乎就沒有看過望遠鏡，因為他都沒辦法看到。」真實的回饋深深觸動羅欣怡。

從政府到民間 突破盲點

經歷十年政府單位的工作後，羅欣怡接到全聯善美的基金會邀約，請她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幫忙。「這也是一個意外的旅程。」羅欣怡畢業後在政府部門任職，從未想過轉換工作場域。但是另一半鼓勵她，「你應該要在民間單位回頭看

政府的作為適不適當，有沒有你以前看不到的盲點。」加上羅欣怡的孩子都在宜蘭出生，她是「宜蘭人的媽媽」。懷著對宜蘭的在地關懷，以及過去因「蘭陽博物館」工作串接的資源與脈絡，羅欣怡加入善美的基金會，著手傳藝中心的翻修與規劃。

短短三個半月，羅欣怡完成傳藝中心整個園區的翻修工作，感受民間組織的彈性及效率。過去在整府單位因採購法規定，需要許多時間完成行政流程，採購之後還需要經歷招標、備料、驗收等等過程。但相較政府單位資源充裕，民間團體編列預算時，需要仔細考慮籌措及運用的方式。

羅欣怡將政府單位的長處，帶入民間組織工作中。尋找傳藝中心的表演團體時，羅欣怡延續她一直關心的「機會平等」議題，改變過去私下招募的做法，參照政府公開資訊的原則，將徵選內容公開，讓不同團隊提案。傳藝中心一年十二個月的演出團隊，都是公開徵選而來。羅欣怡相信建立公開制度之後，即便未來決策者換人，參與傳藝中心表演的機會，便不會成為利益交換的籌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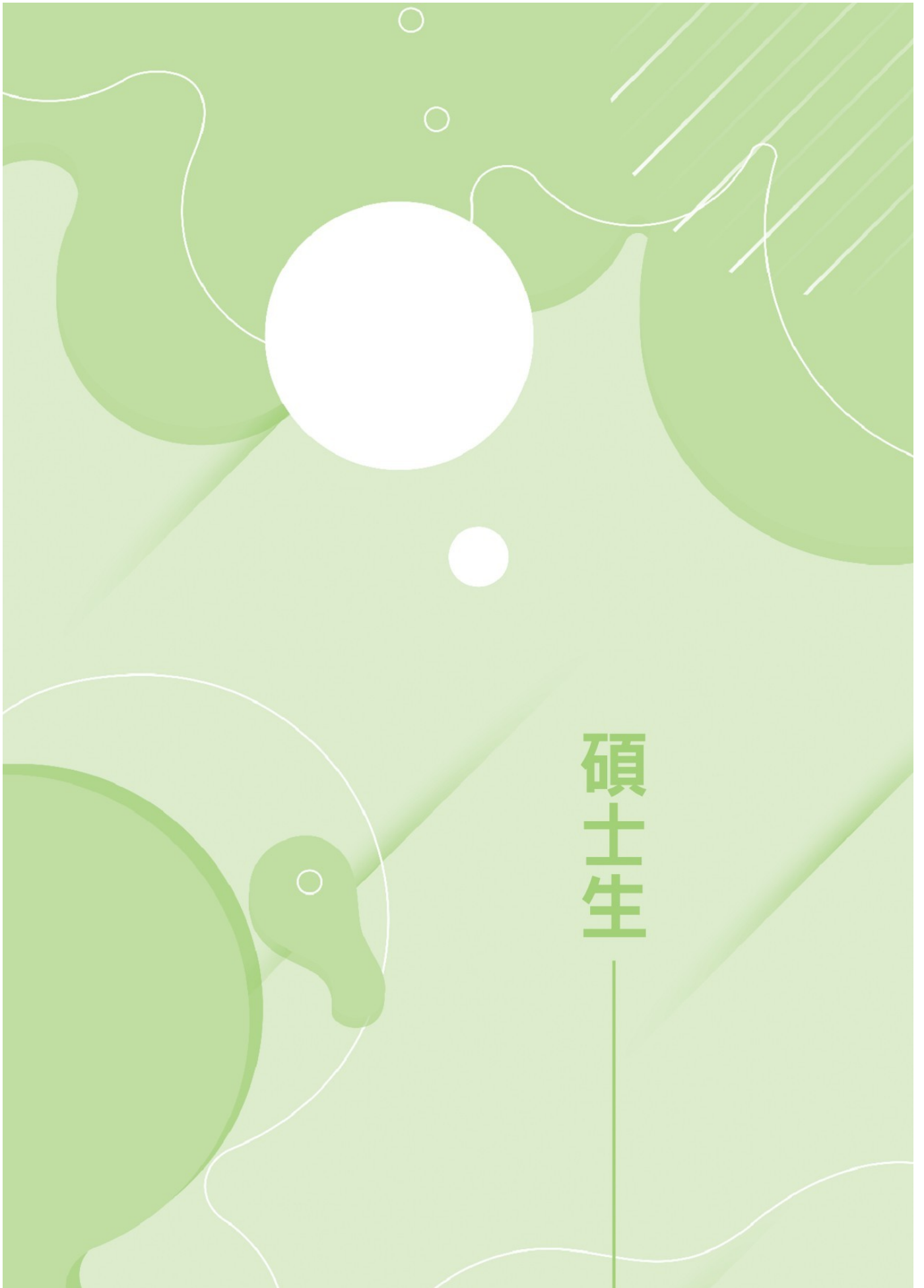
博物館挑戰觀點切入

從事博物館工作多年，羅欣怡觀察到博物館策展的共同目標。她曾經跟同仁策劃地震主題的策展，展覽以第一人稱角度敘述受難者心境。那段期間，許多同事和志工都不太敢進去展間，因為故事太貼近個人感受，看了令人難過。「『如何從展覽中看見自己的故事』一直都是博物館很大的挑戰」羅欣怡提及，在博物館策展的過程中，策展人盡力讓內容貼近觀眾，但並不容易執行。

如果想從事博物館工作，羅欣怡建議，學生要有自己的觀點和文化行政的心理準備。不論策展或規劃教育推廣活動，都需要觀點切入。知道為什麼辦這個展覽或活動，釐清辦展的初衷和核心價值之後，博物館工作者才選擇展出形式。觀點發展需要讓人感受內涵與獨特性，為了反映社會現況，策展時思考時須兼顧文化、歷史和社會脈動。此外，許多人對博物館工作有光鮮亮麗的想像，但實際辛苦的卻是可能佔整體90%的幕後工作。成就一場展覽，背後需要大量行政工作支持，策展資源牽涉到人力、物力、經費和法令的總總限制，加上許多文書作業，羅欣怡也曾經因此感到疲乏。處在倍感辛苦的時刻，羅欣怡不斷回想過去成功的策展經驗，就在每次的疲憊中完成展覽，再以成功經驗做為動力，繼續為下一場展覽努力。







大學生就是很迷惘呀 這是很正常的

陳亮君：「社會教育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溝通。」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亮君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畢業後，轉換跑道，進入臺師大社教所就讀。身為社教系學生，同時也在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工作的她，正踏實邁出每個步伐。

從美術到社會教育

亮君原先就讀北藝大美術系，但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當一個藝術家或創作者。在因緣際會下，亮君認識了「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我是萬華人，協會也在萬華。那陣子一直覺得生活很疲乏，好像沒學到什麼新東西；也發現自己和家鄉好像愈來愈不熟。」正好，協會在當時開了一系列「成為萬華人」課程。幾次互動後，亮君也加入其中，成為協會夥伴，後來又在徐敏雄老師的鼓勵下，考進臺師大社教所。

為什麼從參加課程的學員，變成願意留下來一同工作的夥伴呢？亮君表示：「在協會工作時，彼此之間很有夥伴的感覺！」她再補充：「協會的做事步調比較慢，我們可以確認好每個人的狀態後，再一起往前走，不會一直處於很緊張的狀態。」亮君覺得，協會是一個願意互相陪伴的地方，除了接住彼此的心靈和精神，你也可以很坦率地看見自身缺點。「在這裡，我不會覺得要隱藏真實的自己，或時時刻刻保持完美狀態。」

從美術系到社會教育系，中間不免有一條鴻溝。亮君說，從前在美術系學習的東西，當然也不乏理論，但總是覺得破碎了些。「來社教系，有一個期待是，可以把這些破碎的知識，好好組裝在一起。」進入社教所後，亮君開始慢慢整合這些理論，但因為兼具學生和協會夥伴的雙重身分，她坦言自己投入在讀書的時間沒有想像中多。「我還在學習怎麼平衡。」眯起眼，亮君笑道。

自從讀了社教所，且在協會工作後，亮君隱約發覺，自己好像更知道「教育」是



怎麼一回事。「以前對教育的想法很狹隘。甚至會覺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是不是都有階級之分？」她進一步說：「社會教育，打破我對於教育的狹窄想像。它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溝通——我們怎麼和別人溝通？又怎麼和別人一起學習？」

面對恐懼，擁抱挫敗

在協會工作，曾經遇過什麼挫折嗎？亮君說，當然有。由於協會在做的事，是「整理自己」、「建立人和人之間的互動」等等層面，很抽象，又無法在短期內見效，因此常常受到質疑。「我們就會講很多實際案例和故事，讓大家進到情境中，試著去同理他們。」亮君坦言，這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時候，協會也要設計簡單易懂的活動，直接帶大家做一遍，讓眾人理解，為什麼他們覺得那件事值得重視。

「我們沒那麼目標導向，雖然還是有必須做、必須完成的事，但不一定要一次到位。」亮君伸出手指，在桌上擬畫一條蜿蜒的路。「以前啊！會把事情弄到很『ㄍㄟ』。現在就開始相信，它會慢慢變好，但不會一次變好。」亮君說，現在常常覺得，失敗和成功，其實是很模糊的概念，也難以二分。一次做好，就是成功嗎？還是應該拉得更遠來看？當她意識到這個彈性後，她的心境也開始有所轉換。

50

社氏100度·教室外的光與熱——社教達人專訪

「大學時期，在美術系的狀態是，如果我沒有做好，挫敗感就會很大。然後，我得花費非常多時間去處理那個挫敗感，才有能量繼續做事。」亮君露出釋然的微笑，「後來，我發現那樣對我不太健康，因為龐大的挫敗感，讓我覺得很自卑。後來，想著乾脆不要講話、不要和別人交流。」在協會工作後，亮君開始能夠接受不夠好的自己，對自己的狀態也比較坦然。「只做到六十分，也沒關係，我承認這件事情。」

有這樣的轉變，對她來說是一大放鬆。有沒有特別想對大學生說的話呢？「我覺得就是『不要害怕』。」亮君嘴角仍漾著微笑，眼神則泛起一抹堅定。「大學的我，一直擔心自己做不到，然後就不敢去做。」那時候，她覺得自己很差勁，怕被別人發現自己的不足，於是也放棄和他人交流。「或是，有問題的時候，我也怕自己的問題很笨。」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但其實，當我真的去和老師對話，會發現老師們都很願意和自己討論這些事情。亮君說，對於未知的事，不必抱存過大的恐懼，有時候，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大學生本來就很迷惘呀！這是很正常的。不要那麼害怕，先試著敞開一點吧！」



社會教育就是透過不同的管道去傳遞知識和想法



陳秋欣：「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找到自己的方向，同時又可以包容他人的存在。」

撰文：雷佳儒 攝影：郭哲睿

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畢業後，繼續就讀同校同系的碩士班。她從以前就熱愛社會教育，至今仍在相關領域深耕，常保初心。

深耕社教夢

「其實，在上大學前，對『社會教育』就有一個想像。」秋欣說，「也想過要讀心理諮商與輔導學系。那時候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可以陪伴人們，然後解決他們的問題。」原本就熱愛教育領域的秋欣，在進入社教系後，更加深了對社會教育的喜愛。「教育可以改變很多事！而社會教育，就是透過不同的管道，去傳遞知識和想法。」秋欣認為，原本自己對教育的想像比較狹隘，只能在學校進行，受眾好像也只能是二十歲以下的學生們；然而，其實社會上的大人們，也需要被教育，再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教育想要傳遞的事，就是不要只有一種標準。應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找到自己的方向，同時又可以包容其他人的存在。」要讓每個人的獨特性都存在，就表示社會結構相當多元。「過去的我，常常覺得自己和體制不合。我知道那裡有一個標準，但我不喜歡，我覺得那不是我。」秋欣搖了搖頭，接著說：「對我來說，教育是讓你知道你是誰，然後你想做什麼事。」

為什麼在讀完四年的社教系，仍想要繼續讀社教所呢？秋欣說，其實自己的動機滿強烈的。大二開始，她就在「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工作至今。當時，徐敏雄老師領著他們，一起進行小型讀書會，將相關知識運用在協會工作上。「哇！理論可以這樣被使用。」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理論不是漂浮在天空上的虛無，而是能夠實踐的。」抱持著想了解更多的想法，她決定繼續到社教所深造。



從社教系出發，把小事做大

秋欣認為，社教系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就是發現問題，然後再規劃方案來解決它。也許社教系的學生可以先從小事開始，或是從貼近生活的事物下手，來實踐社會教育的價值。「如果我們讀了那麼多的理論，也學了技術面的東西，但卻無法解決社教系本身所面臨的問題，這就是一個問題呀！」秋欣笑著說，個人和結構永遠搭在一起——你個人的問題，可能就是結構的問題。「與其直接跳入社會，不如先從安全的社教系開始！」

「光是以社教系為場域，就有很多事能做了。組成讀書會或什麼小組都好，一起解決彼此的共同困難。」她建議，大家可以先好好觀察或審視自己狀態，設想其他人可能也遇到類似的困境，然後相信自己有機會處理這件事。秋欣始終覺得，學生自主發起活動、一起討論，是一件很棒的事。「能夠坦承自己的焦慮，和別人一起解決問題，是我現在所追求的。」

接受自己，就是自信

大學就讀社教系，研究所也留在社教系深耕；同時，在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工作。和社會教育如此貼近的這幾年，秋欣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轉變呢？「兩年半前，我不敢接受失敗。」以前，她在做事時，常是背水一戰，總覺得要全部達標才算是成功；如果沒成功，就會覺得自己能力不足、一無是處。

「現在的心態，比較接近『累積』。」她眼神流露一絲光，「不必一次到100。今天累積1，明天累積2，後天累積0.5，都沒關係。這次的失敗，不是為了要達到100，而是累積一個經驗。」她感覺到，自己的完美主義被稍微鬆動了，而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在過程中，不斷檢視自己，我已經做到什麼？我可以調整什麼？」她願意相信，現在的自己，有能力去到心之所向。「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一次』學到，而是『一次次』學到。」

人的改變，相當細微。兩年半前，秋欣也沒想到自己會有這些轉變。每條路，都是一步步走出來的，過程總是不乏驚喜。透過轉換心境，秋欣坦言，自己變得更有自信了，這樣的自信並非源於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因為認識自己、知其不足，讓自己擁有更期待的遠方。



社教所是讓你 慢慢摸索自己與慢慢 理解別人的地方重點 是「慢慢」



楊旻恩：「知道事件與自我的連結」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楊旻恩，現在就讀社教所文化事業組，參與社區營造組織「夢想城鄉」與「六庄」，大學時期曾任學生會會長，長期關注校園及社區的公共議題。

物理系到社教所

楊旻恩大學從物理系畢業後，他發現比起理科，自己反而比較能理解台灣史、社會學等領域，也曾從中找到讀書動力，因此碩士班來到社教所就讀文化事業組。兩個領域看似毫不相干，但楊旻恩大學時，就聽過社教所，聽說很自由且畢業論文題目多元，加上從理科轉換到新領域，更希望擁有探索彈性。

原來萬華不全是「艋舺」

大學延畢期間，楊旻恩修社區總體營造課程，開始參與社區講座及讀書會。楊旻恩是萬華人，某次跟阿嬤聊天才發現，不是整個萬華地區都是「艋舺」，自己家裡所在的位置，若以過去的名稱區分，是「加蚋仔」才對。感受到自身與社區歷史的斷裂，楊旻恩深刻地投入在地活動，成為「加蚋仔」的社區營造組織「六庄」的成員。此外，楊旻恩也參與萬華地區另一個社造組織「夢想城鄉」，與組織共同關注街友議題。

社會實踐與研究所課程，幫助楊旻恩持續進步。他會將實際的經驗帶到課堂上，與理論內容對話，同時接受老師和同學間的意見交流。回應到楊旻恩報考研究所的初衷，不只是為了擁有與社造工作相關的學歷，更是為了持續思考，並且善用學習資源。



楊旻恩說，「（夢想城鄉）協會很療癒。」加入協會之前，楊旻恩有過pizza的打工經驗。餐飲工作講求動作快速且精準，讓動作緩慢的楊旻恩非常崩潰。來到協會之後，協會的工作講求慢慢討論，並且夥伴之間的支持，能發揮每個人的價值，也讓個人的脈絡被看見。「慢慢聽你說」的氛圍，發生在協會夥伴之間，以及協會所關注的皆有族群。透過長時間傾聽與了解，楊旻恩認識街友的狀態，並思考他們缺少什麼？工作的過程中，楊旻恩換了新的角度看待自己與他人。而「六庄」的社區工作同樣放慢節奏。組織由10幾歲到30多歲的人組成，成員皆是在地區民，想要像是馬拉松一般，細水長流地經營自己的社區。

期待更細緻的理解

回顧大學生活，楊旻恩想起從物理系畢業，卻不知道為何而讀，所以希望大學生要試著知道做每件事情的原因，知道事件與自我的連結，或許能因此擁有更明確的目標和踏實的動力。回顧過去經驗，楊旻恩發現自己一直很喜歡「聽故事」，但當時並不將此視為職涯目標，直到反覆感受蒐集文史資料時強大的內在動力，才決定往人文領域發展。延伸現在的學習與實踐，不論面對社區工作或規劃方案，楊旻恩不只努力釐清實踐的意義，更期待自己能更細緻地處理議題以及其中的人際關係。

56

社氏100度·教室外的光與熱——社教達人專訪

「社教所是讓你慢慢摸索自己，與慢慢理解別人的地方。重點是『慢慢』。」楊旻恩重視自我、他人以及事件的脈絡。加上社會教育中的開放和對話性，也是楊旻恩認同的元素。呼應楊旻恩傾向「用爬著脈絡的方式解決問題」，歷時很長，卻能夠創造深刻的理解與信任。

透過社教前進 跨足科技新領域



楊婕：「透過閱讀和書寫日記，
找到自我空間與人際互動的平衡。」

撰文：吳心予 攝影：郭哲睿

楊婕，畢業於社會教育碩士班成人教育組，曾經擔任「時代基金會」實習生、「成人創新方案設計」助教，目前任職於HP惠普公司。

為了擁有作品而讀研究所

從中正大學的成人教育系畢業後，楊婕想要增加提升專業知識的能力，決定報考社教所的成人教育組，繼續深入成人教育的領域學習。回顧大學生活，成教系的學風自由開放，因此楊婕參與許多打工和社團活動，學業成績並不突出。畢業後進入社教所，起先楊婕不太適應新的生活，在台北和系上沒有歸屬感，人際的疏離令楊婕感到茫然。

找到學習夥伴

大四推甄後，楊婕原先在「時代基金會」實習，但是隨著進入碩班並成為社教系課程的助教，楊婕發現無法兼顧實習與課業。某次為了助教的事務提早離開辦公室，被主管唸之後，楊婕反思讀社教所的初衷，是為了產出一個作品，因此辭掉實習工作，要求自己每天到系上。常常待在系上，讓楊婕愈來愈熟悉身邊的空間與人，同時她遇見一群所上學長姐，三個人晚上一起準備論文、讀書，有時候放鬆看電影。楊婕心裡的不安，因為學習夥伴的出現，轉變成為學習動力，漸漸在社教所安定下來。

三年半的時間，楊婕寫完論文並從社教所畢業。細數大學到研究所，楊婕說，「大學是開放並收集資料的時期，而碩士班則是咀嚼這些資料。」碩士生必須一天花十小時或更多時間，坐在書中前安靜閱讀。手邊的事情不多，但相比大學社團的多元性，需要專注把事情做得深入。楊婕也在碩士班時期，透過閱讀和書寫日記，找到自我空間與人際互動的平衡。



社教是一種心態

此外，楊婕把以前的經歷，當作必經過程。大學時期她曾長期擔任服務學習助理，期間體會到，反思讓服務工作產生意義。楊婕很重視社會教育的「經驗學習」，雖然無法控制生命經歷，但是能透過反思了解自己學習的目的，理解所有的作為和經驗所代表的意義。對楊婕來說，社會教育是一種心態，「我懂得如何透過社教，讓自己往前走。」

楊婕想對大學時候的自己說：「欸，你怎麼不看書。」楊婕總是正面看待過去經歷，但是她也相信，如果自己過去可以多努力一點點，或許在專業領域會有更好的累積。楊婕認為，「要先有社會經歷，才能回來用你在社教系學的，運用已經學會的東西，透過方案傳遞給別人。」因此畢業後，楊婕選擇先去曾經接觸過的科技業工作，累積特定領域的知識之後，社教便是很好的媒介，能夠將自己的想法和專業傳遞出去。「我發現很有趣，我身邊的同學或學長姐，工作的領域很多元。進入某一行的專業能力，對大家來說是一個門檻，可是進去之後，都適應得滿好。」

最後楊婕說，正式就業前，她要去法國一段時間，想要找回對語言的熱情。她大學時候學過法語、當時放棄了，碩班期間，楊婕乘著在法國當志工的經驗，準備考試、考到法語檢定。楊婕為了尋找學習動力而前往法國，如同她自述是「不安於現狀」的人，繼續帶著充滿好奇的社教心，往新領域前進。

